

## 田野研究與本土學術

### ——對兩部村莊政治研究著作討論的綜述與思考

◎ 易 辰

于建嶸：《岳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岳村政治》和《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是近來學界和媒體較為關注的兩部研究二十世紀中國村莊政治的新作，自兩書出版以來，書評和網評不斷，近期，北京大學「北大在線」網站又組織召開了「中國農村社會狀況與研究方法——兼評《岳村政治》及《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學術研討會，邀請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人民大學、《中國社會科學》、《社會學研究》、《中國改革》、《南風窗》等單位的專家學者評論兩書。在這些評論與討論中，學界對兩書所採用的田野研究方法及作者所追求的社會科學本土化的努力給予了充分肯定。為了將由兩書所引發的討論推向深入，本文特對相關討論進行綜述，以期得到進一步的呼應。

### 走進田野 返回常識

近二十年來，國內研究中國農村社會與政治轉型的著述甚多，而《岳村政治》和《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以下分別簡稱《岳村》和《雙村》）只是兩部村史，它們分別研究了湖南省岳北地區岳村和四川省川東地區雙村的二十世紀百年歷史。兩部小小的村莊歷史之所以能夠引起學界和公眾的注意，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在於它們所採用的研究方法和文本表述方式。

誠如兩書作者于建嶸和吳毅的博士論文指導教師徐勇所說，它們是以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所強調的田野工作為基礎，分別「由外向內、由國家到鄉村社會，由縣到鄉，再到村」和「由內向外，由鄉土社會到國家，由村莊到鄉，再至縣」，以完整地展示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是怎樣一步步將底層村莊結構化於國家政治體系之內，又是如何對村莊社會的權威與秩序進行更迭和重新塑造的<sup>1</sup>。

應該說，同樣的主題並非完全無人涉及，但主要以被調查者的口述資料為重要依據來完成這項研究的，目前在國內的確比較少見。作者何以會如此勞神費力地去從事這一工作？難道僅僅就是為了展示出作為歷史之另一層面的底層社會史嗎？不能說他們沒有這方面的打算（見後文的分析），然而，他們這樣做卻又有更深的立意，那就是力圖通過田野研究，以獲取本

來是常識卻又被日漸遮蔽了的中國經驗<sup>2</sup>。

在近年來關於學術本土化的討論中，作為學術研究基礎的中國經驗究竟是甚麼，已經引起人們的討論。隨著對現代性的重新審視，人們逐漸自覺到過去幾十年來被視為當然事實的所謂歷史和經驗（指按照現代化視角和理論框架建構與書寫的那種中國歷史和經驗），原來卻已經在歐風美雨不經意的「浸淫」之下發生了某種走樣，或者說已經不自覺地按照西方的現代化框架被形塑成為某種被嵌格在人類社會發展（其實是西方社會發展）某一階段上的整齊劃一的編年史<sup>3</sup>；結果，中國的歷史與經驗被異化為西方化的中國歷史與經驗，中國的問題也便成為西方化的中國問題，而我們的一些研究者卻又以這樣的一些「歷史」、「經驗」和「問題」為依據，去爬梳和提煉理論。於是，許多所謂的「中國研究」，實際上也就成為證明某種人類從過去走向未來的大一統普遍歷史和世界觀的一部分，並進而反向性地再回過頭來指導我們對歷史與現實的認識。

這樣做的結果，在幫助我們梳理出某種知識的秩序時，卻又不經意地造成了更多的無序和文不對題，以至於《雙村》的作者進入田野之後，發出「究竟是實踐落後於理論，還是理論與現實存在著距離，進而我們所具有的理論本身是否也可能存在問題」的疑惑與反思<sup>4</sup>。而兩書作者為解答疑惑所採取的方式就是走進田野，在盡可能摒除西化式「有色眼鏡」的遮蔽之後，重新「發現」真正屬於我們自己的歷史、生活和問題，即如一些評論者所說，「讓農民自己說話」，「從鄉村研究鄉村」和「以農民的眼光看待農村」<sup>5</sup>。於是，這裡的所謂「田野」，既可指作者所擁有的研究場域，卻又已經不是單指農村；這裡的所謂「讓農民自己說話」、「從鄉村研究鄉村」，既可以指研究對象在作者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卻又已經不是單指農村和農民問題的研究；這裡的所謂「以農民的眼光看待農村」，既可以指作者所持有的研究視角，卻也已經不是局限於對作為歷史經歷者的農民生活和文化的理解與闡釋，而是具有更為廣泛意義的，如柯文（Paul A. Cohen）所強調的那種對中國問題的研究應該走向「從中國研究中國」的態度和立場<sup>6</sup>，走向中國主位——一種在揚棄了傳統中國中心觀和西方中心主義之後的中國主位。

「這是一個重要的自覺」<sup>7</sup>，這一自覺對於作者能夠真正通過「走進田野」去「返回常識」是十分重要的；結果，誠如評論者所說，兩書作者注意到<sup>8</sup>：

當前中國學術界對中國現實乃至歷史的研究中，因為缺乏經驗常識，或這種經驗常識被「西方理論」的遮蔽，而成為有問題的研究。就農村研究來說，學術界的農村是理論的農村，並不是真正現實的農村。這種與現實脫離的農村及其理論對於理解更不用說是改造現實，是有些力不從心了。要真正做好農村研究以及其他關於中國的研究，就必須回到常識，回到個案，回到農村和中國經驗中來，對農村和中國當下的狀況與處境作出理解，在中國問題和農村問題的語境中建構理論。

評論者進一步討論了如何才能有效地進入田野與返回常識的問題。例如，關於實證研究，吳淼在〈從鄉村政治研究到鄉村政治學〉一文中認為，「以實地調查為研究起點，並用第一手資料為素材來表述農村政治現實幾乎成為主流研究路徑，泛道德和學院式的研究方法之市場日趨萎縮」。但是，也出現了另外的問題<sup>9</sup>：

一是偽實證，即研究者以習得的成套理論和強烈的價值偏好為眼鏡，在實證調查中不恰當地裁剪和取捨事實，不僅使實證材料成了先入為主的理論之奴婢，還使調查對象以片

面的面相呈現給讀者；二是實證主義（當然不是哲學意義上的），即研究者對描述的對象缺乏一種整體的視野和超拔於具體事實的理論關懷，不能以理性的思維對材料進行學術整理和表述。

就此，他肯定《岳村》所做的探索，認為作者在調查中既摒棄了先入為主、以個人價值偏好取代客觀事實的做法，又沒有被經驗事實和感性材料所迷惑，而是以嚴密的理論工具對田野調查資料進行知識性思維和學術加工，努力實現田野調查與理論研究的對接。

另一論者在談及《雙村》作者在為自己所設定的「理解者」立場時，也充分肯定「理解」是躲避「城市知識份子／普通農民、城市／農村、大理論／小敘事、西方／東方、中心／邊緣」這些「前者的強勢及其對後者的遮蔽的一個可行的理路」，指出作者堅持「鄉村主位、農民主位」，「讓鄉村社會自身的歷史和話語從陳跡中顯現出來，從而既挑戰了既有的、自上而下的解釋邏輯的合法性和自洽性，又和緩了『理解者』與『被理解者』之間的生活經驗和認識邏輯的緊張」<sup>10</sup>，從而給我們重新爬梳中國的學術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 小歷史和大歷史

評論者認為，兩書分別通過岳村和雙村這樣兩個代表二十世紀中國鄉村衝突型和常態型村莊類型的微觀而具象的村莊社區小歷史的敘述和分析，深化了人們對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社會大轉型中鄉村社會自身變遷歷程和軌跡的認識，在較為成功地實踐其通過田野研究返回中國經驗常識這一學術關懷的同時，也豐富與活化了二十世紀中國鄉村政治的圖像，改變了我們對一些所謂當然「歷史事實」的認識，進而有助於重建此一時期的大歷史。

對既有歷史和理論的反思與重建，並不是僅僅有一個本土化的理念與立場就得以解決的，它同時需要與之相適應的技術。對此，海外中國農村研究專家黃宗智在討論如何克服有關中國研究中所存在著的規範認識危機時就說過<sup>11</sup>：

從方法的角度看，微觀的社會研究特別有助於擺脫既有的規範信念，如果研究只是局限於宏觀或量的分析，很難免套用既有理論和信念。然而，緊密的微觀層面的信息，尤其是從人類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第一手資料和感性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得出不同於既有規範認識的想法，使我們有可能把平日的認識方法——從既有概念到實證——顛倒過來，認識到悖論的事實。……基於同樣的原因，地方史研究也是有用的方法。在對一種因素或一組因素的宏觀研究中，我們很難對不同因素間的假定聯繫提出本質性的疑問，而地方史研究通常檢閱了一個特定地區的「全部歷史」，從而有可能對不同因素間的關係提出新鮮的問題，避免把某一歷史過程中發生的一些聯繫套用到另一歷史過程中去。

兩書作者對此有清醒認識，吳毅在「北大在線」組織的研討會上就說：

要通過村莊的田野研究實現理解大歷史的關懷，必須梳理出擺在我們面前的三種「歷史」的嚴格區別，即（1）史家筆下的大歷史與社區微觀歷史的關係是甚麼？（2）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歷史神話是如何被形構成被研究對象自身的社會記憶的？即國家政治文化是如何進入農民身體的？（3）如果有可能剝離意識形態對社區記憶的影響，有無可能還原或者盡可能去重構作為歷史經歷者所經歷的小歷史？因為這才是田野研究真正的價值所在。

而他在一篇回憶雙村調查的田野札記中也說<sup>12</sup>：

我想要盡可能忠實地記錄下雙村人在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紀百年政治變遷中留下的足跡，再現他們被歷史前行的巨輪所碾壓出來的生命印跡，我知道這些不起眼的印跡無法進入由史家建構的宏觀歷史的大視野，它們只會作為經歷者的記憶而暫存，然後隨著他們的離去而消逝，然而我卻想要穿透歷史大話語的迷霧，盡力去展現底層蒼生在這場社會大變局中那即使是如螻蟻般的精彩和悲淒，這些底層的精彩與悲淒與偉人們所書寫的歷史相比十分渺小，卻是真正屬於雙村人自己的政治歷史。

也許正是得益於這種對村莊社區小歷史的疏理和分析，兩書才有可能較為成功地實現對大歷史話語的挑戰。周泉指出，《岳村》從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切入，通過對湖南省一個典型的衝突型村莊濃墨重彩地描寫，論證了農村政治經濟結構變遷背後的經濟和文化根源<sup>13</sup>。張行健認為，《岳村》深入探討了我國近一百年來的農村政治結構，描述和分析了歷史和現實的農民反抗情景、形式和原因<sup>14</sup>。張曉山認為，《岳村》運用「城市與鄉村的二元政治結構理論」的分析，得出隨著國家對鄉村經濟依賴性的減弱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行政權力將逐漸退出鄉村政治領域的結論，是一個具有重大理論和實踐意義的命題，在當前「三農」問題日益突出，農村開展稅費改革，並輔之以精簡鄉鎮機構，適當撤併鄉鎮等措施之時，深入探討這一問題就更為重要<sup>15</sup>。

榮敬本則認為，《雙村》通過對影響二十世紀中國村落社會變遷與轉型的基本變量現代性、國家和地方性知識這三者之間複雜博弈關係的清理和展示，對新時期重構國家和地方性之間的競賽制度和秩序的啟發，是該書特別有價值的地方。榮敬本還認為該書對土地承包制度的討論也十分有意義。他說：作者認為土地承包制這種土地分配方式帶有村社制的特點，具有明顯的過渡性質，「這是否可以對馬克思主義關於村社制度的長期爭論作出新的貢獻，這是我們予以希望的」<sup>16</sup>。張鳴認為，《雙村》通過對微觀村莊社區歷史的深入挖掘，對「後革命」時期村莊政治的形成和延續，尤其是對土改、中國國家與農民的關係、農民的公私意識與集體化的動力、當代農民的歷史意識積澱及新時期國家對鄉村改造的成效與局限等一系列「現時農村社會共性的問題」，都提出了相當深而且透的見解<sup>17</sup>。蕭斌認為，閱讀《雙村》使我們得以知道，「眼下正在展開的鄉村政治的現實片斷，實際上並非一段無根無由的『新歷史』，而是既往一百多年村莊治理變遷史的延續，它所面臨的問題，它所形成的話語，也是歷史上類似問題與話語的再造」<sup>18</sup>。劉義強認為，「走進農民的日常生活，聽懂農民的生活邏輯，理解一個微型村落百年變遷的權威與秩序形貌，是不是可以讓我們有更多的底氣應對強勢話語權力，為中國鄉土經驗和可能的話語構建探索一個可以安放的空間？」而正是在《雙村》作者所設定的「理解者」的眼中，「一些宏大話語，諸如『國家政權建設』、『國家與社會』，還有我們僵硬的二十世紀現代化的歷史陳述，都不小心露出了尾巴」。因此，「作者對於雙村百年變遷的體驗和感悟，其結果絕非尋找一個真實的村莊故事，而是尋找村莊內外知識的相遇」<sup>19</sup>。

的確，正是在以小歷史，即以作為經歷者的歷史去反思已經成為一種意識形態的宏大歷史這一點上，評論者都認為兩書做出了極有價值的探索。這種探索不僅有助於理解二十世紀中國鄉村歷史本身的多面性和複雜性，似乎也是當前一條值得大力提倡的學術路徑，尤其是當整個中國的社會理論被宏大話語霸佔著的時候，作為一種社會科學的文本表述方式，個案調查這樣的小敘事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 重建中國的經驗與理論

對兩書的評論還涉及到應該如何重塑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問題。在「北大在線」組織的研討會上，北京大學謝慶奎認為，要想形成對中國切實有用的學術，就必須從中國實際出發，而不是從西方理論出發，通過對中國社會的實地研究來提升中國的學術水平。就此而言，田野調查方法的啟示意義並非只限於農村研究。例如，要想形成對中國有用的社會與政治理論，應該提倡學者有必要走進相關研究的實際社會場域，在實踐中思考甚麼是真正的學術問題，只有首先解決這個問題，所謂解釋中國社會的理論才能呼之欲出。

北京大學徐湘林反思了當下一些學者言必稱西方，僅止於以解釋西學為滿足和以研究西學成名為榮的做法。他認為，這種現象對於學者個人而言無可厚非，但若成為一種佔據學術界的主流現象，則對中國現代化的實踐和學術思想的發展不利。他以國內政治學研究為例，指出中國政治學的理論來源有兩個：一個是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它在方法論價值方面的批判力與讚頌力同樣強大，但有時候也會面臨解釋困惑，處理不好的話，也可能存在教條化傾向；另一個是當代的西方理論，這些理論是西方社會幾百年政治經驗的總結，並不是可以不加置疑就運用於中國的。西方學者早已意識到他們的理論並不具有普適性，因此他們重視對地方性知識和異文化的研究，以增進學術的反思性。但國內研究者在運用這些理論時卻缺乏反思的警醒與自覺。因此，他認為從紮實的田野工作出發認識本土社會與反思理論十分必要。

諸多評論也涉及到兩書所存在的不足以及田野研究應該如何進一步深化。北大研討會上，中國社科院樊平認為，《岳村》在如何解決大事件、大理論與村莊自身歷史與經驗的關係方面，尚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也就是說，個案研究的首要功能是反映與揭示鮮活的生活，在生活中提升與抽離出理論，而非用現存的理論框架去搜索與裁減材料，如果對此沒有自覺，勢必影響到個案本身的價值。而《雙村》在關注社區變遷與宏觀社會—歷史的交融時如何凸顯焦點性事件，如何進一步處理好個案表達與一般性理論之間的關係，也是需要進一步探討的。

中國人民大學張鳴認為，在歷史史料和文獻的引用與證明上，《岳村》似還有需要斟酌之處；否則，難以保證研究的真實性。而《雙村》在將社區人民的真實生活歷程與心態剝離出意識形態化的大歷史，重建作為事件經歷者的小歷史方面，也存在著可以進一步挖掘的地方。針對歷時性縱深研究的長處與局限，中國社科院折曉葉認為，從縱向方面追尋歷史發展的線索，可以較好地再現傳統在現代化變遷過程中的延續，但也容易忽略對橫斷面的研究。因此，在運用縱向歷時研究方法的同時，也應該注意對橫斷面的研究，注意歷史傳統在橫斷面的社會場景中的展現，研究它們在一定場景中是如何被激活的，人們又是如何對傳統因素進行利用和再生產的。現代化過程是一個現代性與傳統相互交融的過程，農民的生活和觀念不是在一天之內發生改變的，個案研究就是要盡力去展現這一複雜的過程。

《社會學研究》編輯部張宛麗也提醒學界，中國社會科學的本土化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果切入的研究目標和手段太明確，本土化目標與所使用的工具之間可能會產生某種張力，因此，學者進入研究時必須彌合目的與工具之間的緊張，處理好本土化努力與所採用工具之間的關係。而針對目前田野研究中所存在著的研究者自身的社會關懷與學術關懷的緊張，北京大學張靜指出，研究者要自覺兩者的關係，要注意到兩種關懷所持立場與使用話語的不同；但是，無論是一個做政策研究的學者，還是一個以學術關懷為己任的學者，都要注意傾聽對方的聲音，理解和尊重對方的立場，並從對方的看法中獲取對自己有益的影響，只有這樣才

能夠做到相互推進，否則可能是找不到自己的立場和方向<sup>20</sup>。

一些評論文章還強調了大話語在學術研究中所具有的強勢滲透與慣性以及兩書作者在這方面所遭遇的困惑與兩難。他們指出，即使是有強烈的回到常識意識、站在農民和農村主位來閱讀村莊社會的學者，也常常會在離開村莊經驗時，不自覺地再度陷入大話語的陷阱。這些困惑不僅是兩書作者的，可能也是我們這一代學者都會遭遇的，畢竟歷史不可能完全割斷，西方的大理論也不可能完全拋棄，由此足見學術本土化的努力是一個長期和艱辛的過程<sup>21</sup>。

## 註釋

- 1 徐勇：〈鄉村社會變遷與權威、秩序的建構——對兩部鄉村政治研究著作的評價和思考〉，《中國農村觀察》，2002年4期。
- 2、7、8 賀雪峰：〈理論要返回常識〉，《中國改革報》，2002年6月17日。
- 3 楊震林：〈現代化的反思：來自村落社會的求證——評吳毅著《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天津社會科學》，2002年6期。
- 4 吳毅：《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377。
- 5 周泉：〈讓農民自己說話〉，《南方周末》，2002年4月25日；項繼權：〈從鄉村研究鄉村——評《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開放時代》，2002年4期；黃輝祥：〈以農民的眼光看待農民——讀吳毅著《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社會科學報》，2002年8月8日。
- 6 參見柯文（Paul A. Cohen）著，林同奇譯：《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北京：中華書局，1989）。
- 9 吳淼：〈從鄉村政治研究到鄉村政治學〉，《中國圖書商報》，2002年5月30日。
- 10、19 劉義強：〈「理解者」眼中的鄉村故事與鄉土經驗〉，北京大學《中國學術城》網站，2002年6月。
- 11 黃宗智：〈中國研究的規範認識危機〉，載氏著：《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北京：中華書局，2000），附錄部分。
- 12 吳毅：〈記述村莊的政治〉，未刊稿。
- 13 註5周泉。
- 14 張行健：〈為生民立命——《岳村政治》讀後〉，《工人日報》，2002年6月7日。
- 15 張曉山：〈鄉鎮體制改革之路〉，《中華讀書報》，2002年6月5日。
- 16 榮敬本：〈現代性、國家和地方性三者的博弈關係——評吳毅著《村治變遷中的權威與秩序——20世紀川東雙村的表達》〉，《中華讀書報》，2002年7月3日。
- 17 張鳴：〈「後革命」之後的困境〉，《書城》，2002年7期。
- 18 蕭斌：〈對「三農」問題的歷史解讀〉，《社會主義研究》，2003年1期。
- 20 以上凡註明作者單位的評論均為在「北大在線」研討會上的發言。
- 21 參見前引項繼權、賀雪峰、劉義強諸文。另外，受本文主題所限，尚有一些評論文章和研討會發言的內容沒有述及，特此說明。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刊文字或圖片，必須先獲本刊書面許可。